

三长两短

现在是二零一九年三月三日的凌晨三点十三分。

写完前一句话时，我已开始发现这句话无甚价值。

原因在于，写完第一句话时，我思索良久，后半句该写什么，遂发现时刻已经变化到了二零一九年三月三日凌晨三点十五分。感谢时间的变换，使我不至于失语。我至少指出了时间的变化，即便这是寓于时间本身的，毫无新意或者主观能动性的事件，但是指出这一事件本身将会带有，或者我能够通过指出这一事件迫使一些善良的读者觉得我带有，某些深刻的企图。

我是否其实有这样那样的企图，本身无关紧要。当我说无关紧要的时候，我可能真的认为我心之所思过于渺小琐碎，不值一提，但是我说我的企图无关紧要这一事件本身，乃至我说我认为我的心思太琐屑卑微这一事件，也可被解释出很巨大的含义。不过我的企图本身作为不可测的变量，任何您觉得我怀有的企图也不过是您对我的臆想，哪怕它正好是正确的，即和我现在的想法一致的，您也不会有机会被告知，即便被告知，您也未必会相信我对您猜测的肯定。

如果我声称我将拒绝我的话语被进行精神或者形式的分析，那么这一句话本身也可以被分析。当然我并没有说出这句话，但是为了说明这句话可能有的作用的这句话，它本来应该成为更进一层次的否定，从而获得更重的权柄来抵抗分析，但它也只会沦为分析的对象，被解构、揣摩。

诚然我是指它们可以被解构和揣摩，而并不代表它们值得被这样做或者确实会被这样做。这世上值得被分析的文本正在以比负责分析的人们工作的速度更快的速度产生着，按照优先级来说，我大可以期望这片言语永远不被分析。

如果概括一下我在二零一九年三月三日凌晨三点十三分到二零一九年三月三日凌晨三点二十三分写下的这些话的内容，现在已经变成二十四分了，如果写得够快，我就能在二十五分钟前结束这句话，免得修正必须无穷无尽地进行下去。那就是：我在否定文本的解释权，即确保我的文本不被解释。

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的一大基本原理就是文本的独立性。文本立，作者死。而文本本身将成为一个供读者映射自身的空间，所谓映射自身的空间，我指读者您需要将批判思维中的自己投射到文本生成的空间中，并从文本中审视自己。但是我不想我的文本起到这样的作用，所以苦心地阻止它这样，当然从结果上适得其反。越发的辩驳只会使得文本越发扩张，提供更多的、如果不是更使人困惑的方向。没有作者能使自己的文本脱离读者的诠释，就像鱼没法说自己恐水一样。

但是即便出于渴望被分析以外的理由，人还是愿意写作，以作为自己身体上的某种伤疤，记录下时间的经过。但是写作后又特意给别人看的文字，又只能有除了形成外部记忆以外的其他使命了。

通过构造文字，我显然在尝试，或者表现出一种尝试，来抵抗它必然会面对的将来，而且它和制造它的人也都应该很清楚，这种抵抗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际上都有害无益于最初的目的。恰恰相反，拒绝阐释的更明智的做法就是停止生产文本，封闭自己的内心活动。

然而我拒绝。

我要拿着最大号的喇叭，把音量开到最高，跑到每一个我能看到的人身边，把喇叭口抵住他或她的耳朵，声嘶力竭地告诉他或者她我是一个哑巴。

希望您还不至于觉得生产这些文字的人已经陷入疯狂，如此考量大可不必。须知作为第一人称的叙述者、那个从批判的角度提醒您区分他自己和这个第一人称的叙述者的第一人称，

以及以此类推的无数个第一人称，再加上某些自大的理性主义者认为必须存在以结束这个第一人称链条的某个第一人称，都是不同的角色。很难说明其中一个的观点从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另一个的。

我本来有过更朴实的计划，它们更有温度，更使人联想到春夏，还有土地上新长出的药草：去爱一个人，给她我全部的悲伤；找到一场大雨中的第一颗雨滴，歌颂它的勇敢；监视太阳落下，然后做漆黑从地表疯长的证人，使夜就不必通过自己的泯灭来证明自己和白天一样永恒。

我想做一个怀有希望的人，怀着它活着。希望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就算折断我的肘，我的目光再不能聚焦，前额叶永远地丧失技能，怀有希望也给予我一种高贵的体验。但是这究竟是不能永续的麻醉，否个某个时候我忘记了给自己注入足够的剂量，而戒断症状又过于强烈地将我剥离开原来的感知，以察觉它的本质，终究放弃了它本身。说是放弃也不准确，我仍旧依靠这种麻醉剂来使得心脏能够持续地暴烈下去，它引导我计划我的生活，一小时内、一年内、十年内乃至一分钟内的。

不过不认为希望的效果实际上是麻醉，跟深信希望本身并不存在、再默许它进行麻醉有所不同。希望属于活着的人，它施舍予活人高贵。拒绝施舍的代价就是断绝生活的高贵或者仪式感、使命感，不管您想怎么称呼他。承认生活并不高贵时，就要面对生活的卑劣，而这卑劣终究是不可长久地与之相处的，那余下的路径唯有死亡。

这一死之“唯”并不是说死亡本身很唯美梦幻，没有人能确保自己死得体面。任何一种走向死亡的过程中都必须经历过于繁杂的一系列事件，以确保人体这个精巧的有机体不会出于精神或者肌肉的任何力量苟延残喘下去，哪怕这其中伴随的痛苦不至于喧宾夺主，走向死亡的过程也使得死亡本身沦落为一个好似被间接、机械实现的结果，而失去一种独一无二、不得覆盖的、神圣的目的性。这目的性并不是因为死亡很神圣，而是因为死亡给生活传达一种态度，就是除了举白旗投降，跪在希望面前之外，一个人其实还很游刃有余。不信请看着，深入我胸口的刀，插在肋骨和肋骨之间。截断在我的血肉外的刀柄，在我化为灰烬以后的很长时间内，都将代替我的手指，六亲不认地挺立，漫长地诉说鄙夷。

为什么要活着跟怎么活着都是超越个人掌控的事宜，但就这一死本身，个人尚有主动权。当然我身边的很多人已经死了，有的人已经死了很久了，不过他们还是看起来很高贵地活着。刀锋和刀柄很多时候突兀而又优美地和他们的身体融合，仿佛他们就是带着那些赐予自己死亡的物品而出生的。

在死亡以后，人还要负责埋葬自己。打造自己的棺木是每个人的使命，它就和给生命赋予意义一样是人世的诉求，甚至可以说锻铸棺材本身就是生命的意义。在我们死亡时，我们应该保持尽量清醒的理智，将那些足以证明我们的死亡是完全出于自身的意愿，而不是出于被迫和妥协的物件，庄严地陈列在身边。如果可能的话，也应该用纸笔尽量工整地写下自己墓碑上需要被刻上的字迹，然后把这张纸钉在胸口。

棺材由三块长木板，两块短木板组成，设计上，三块长木板应该分别靠在人的左右和背面，两块短木板应贴着头顶和脚板。但这也终究是太过于形式化、充满生活气息，即充满活着的人想要强加给死去的人的形式。我的左手就可以做左边的长板，右手做右边的长板，脊背做背后的长板，脚掌做脚底的短板，再拿一块钟表，就像现在这个，指向二零一九年三月三日凌晨四点十八分的钟表，顶在头上做我头顶的短板。时间的继续流动对于死人而言尤其重要，尤其不能让它停在我死亡的这一瞬间，需知凭这点，人还能够再多愚弄生活一次。

面前的棺盖是不必要的，因为它将可能破坏耸立在我身前的刀子的形态。

躺下后，为了减轻痛苦，此处的痛苦应该定义为从肉体内的神经感觉到疼痛刺激的瞬间到死亡导致它们失去功能的时间。我抬手扼住自己的喉咙，这使我变成了哑巴。

03/03/2019 4:49 于上海交通大学